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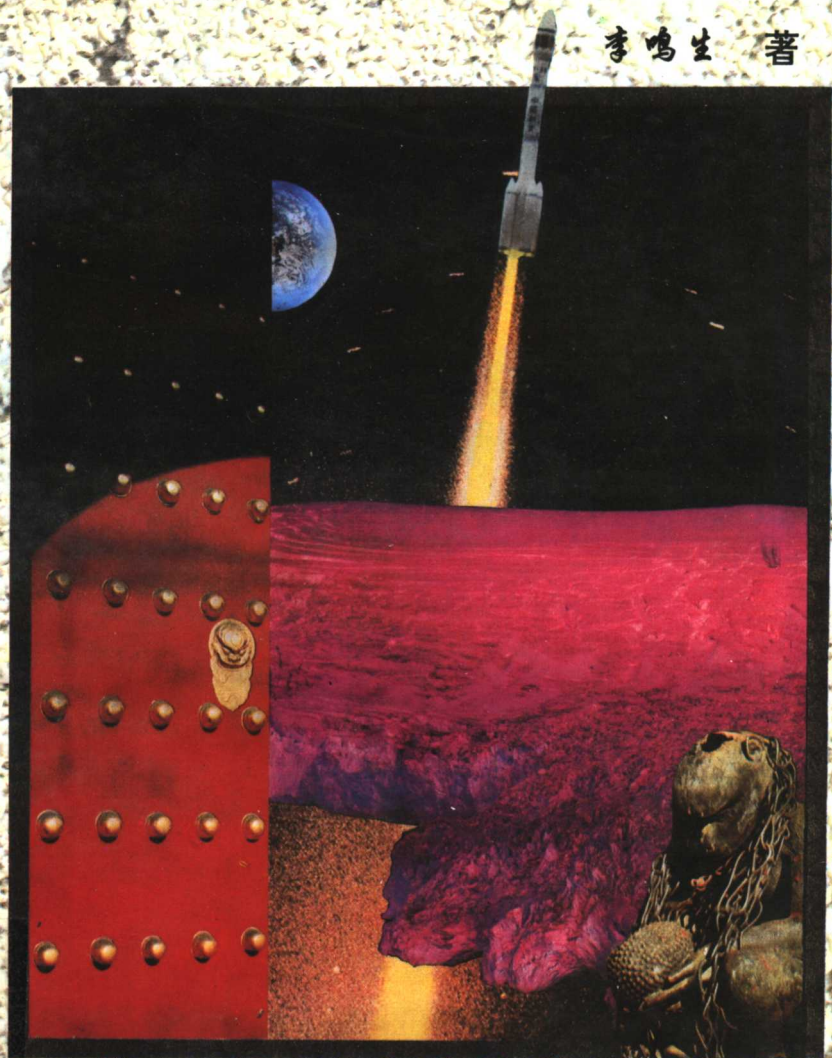
中国航天发射大写真

李鸣生航天四部曲

# 飞向太空港

FEIXIANG TAIKONGGANG

李鸣生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飞向太空港

FEIXIANG TAIKONGGANG

——中国航天发射大写真

李鸣生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59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278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10.125印张 4插页 229千字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11-02836-X

I·37 定价: 1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 梦想与境界

## ——关于我和我的航天四部曲

大凡曾经活过和现在活着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

当作家，是我10岁就有的梦想。

这个梦想如今想来很是可笑，甚至简直不可思议。我祖宗三代都是文盲，我母亲是位勤劳的家庭主妇，聪明能干，记忆力超人，并一惯喜欢做善事，遗憾的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我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却同样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且老于世故，深谙人事，无论是社会阅历还是处世经验，都十分丰富，尤其是对人世间的暗道机关、风云变幻，总有自己深刻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然而同样遗憾的是，父亲除了儿时私塾混过几天，能时不时地给我讲上几段《增广贤文》中的警句外，也从未正儿八经上过一天学。因此，我正直善良的父母除了从小教我做人外，在文学上绝对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我之所以想当作家，不过是我10岁那年有一天偶然翻到《红楼梦》时蹦出的一个荒唐念头罢了，而我下决心要当作家，则是因为后来上中学的事情。

我小学毕业时仅有11岁，因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已在全国掀起

了热潮，我便自任为“长征队”的队长，带着22个男女同学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开始了我的“11岁长征”。大串联归来后，满怀“革命热情”的我便以“李超华”的名字第一个给校长刷出了大字报，从而拉开了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序幕。接下来我又出任了红卫兵兵团的政委，带着一帮“革命小将”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考试一向名列前茅这次同样考得相当不错的我和另一名同学竟成了“备取生”！面对人世，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感到了不寒而栗！我以为我上学的权利从此就被剥夺，可开学时又意外地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我的那位同学因为赌气发誓再也不读书，而我同样因为赌气则咬着牙上了学。其想法是：不让我读书，我偏要读书，而且一定要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看！因为从小便喜欢读历史故事的我，这时已经读到了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于是“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思想便坚定地支撑了我的灵魂。

但在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年代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依然本性难改我行我素，坚持沿着毛主席老人家指引的方向继续“革命”。结果，年仅13岁的我在上千人的大会上遭到了批判，并被罗列了20多条“罪状”：“为刘少奇翻案”、“想带知青暗杀武装部长”、“喜欢和‘牛鬼蛇神’在一起”（这是事实，因为我感到“牛鬼蛇神”都很有文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等。从这时起，我感到了世界的黑暗和人生的可怕，并改变了我过去对世界和人生美好的看法。因此，如果说“备取生”的事对我想当作家是一次强烈的刺激，那么这一来自政治上的打击则促使我抱定了一定要当作家的决心。因为在年幼无知的我看来，只要当了作家，就能对那些假丑恶的东西进行揭露，就能对那些专门整人的“当官的”进行清算，就能向社会讨回一个公道，就能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给长期受欺受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喊冤叫屈壮

胆说话！

于是，我的性格开始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我，天性开朗活泼，敢说敢言，无所顾忌，是个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的家伙！以致至今我还记得小学班主任老师每次集合站队时都要大声训斥我的一句话：“李东升（那时我叫李东升还不叫李鸣生），你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啊！”可从那以后，我变得沉默寡言，少年老成，原本乌黑的头上渐渐有了白发，用今天的话来说，开始了由个性的人向社会的人的默默转化。

这一时期的我虽然仍在学校念书，却从不好好听课，“国家大事”也不再关心，而整日陷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自我陶醉之中。为了实现当作家的梦想，白天我独自躲到校门外的树林里去读书，晚上我用被子堵住窗户偷偷读书，不管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凡是被当时说成是“黄色的”、“反动的”书，我都怀有一种似乎是天生的兴趣，想方设法找来偷看。连当时在全国遭到批判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也在床底下偷偷藏了七年！甚至当“破四旧”的大火焚烧书籍时，我竟置熊熊大火于不顾，斗胆从大火堆里去偷着抢书！我整日与书为伴，夜夜同古人交谈。尘世，离我渐渐远去，古书，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为了追随古人，我还给自己的名字取了一个系列：姓李名东升，字文秀，号傲君。或许正是受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响，加之我天生孤傲，个性极强，帝王思想严重，故从小学六年级起至高中毕业，老师在我期终评语一栏中填写缺点时，总是两个字：清高。可笑的是，我第一次见到“清高”两个字时，连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但“骄傲自满，狂妄自大”，成了我青少年时期一直想卸却又总也卸不掉的精神包袱，使我至今还常常告诫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作文，但得夹着尾巴做人。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时期对我影响最大乃至影响了我一生的,是屈原老先生。在中国所有作家中,对我思想造成了影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古代的屈原,一个是当代的鲁迅。不知什么原因,对屈原的《离骚》我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和通悟感,第一次碰到它,就如同触电一般,但年仅十三四岁的我基本看不懂,便一句一句地抄在本上,然后逐字逐句地去查字典,再把注释写在旁边。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郭沫若翻译的《离骚》的白话文,才使我渐渐走近屈翁,直至最后一头醉倒在屈翁的怀里再也不能自拔。屈翁怀才不遇、惨遭流放的落魄心境与我当时受屈的心境一拍即合,以致使我常常站在家乡的河畔一边仰天长叹一边遥想着当年屈翁沿江而行的孤傲身影,心里还默默吟诵着屈翁《天问》中的神圣诗句。于是,汨罗江之水始终在我心中翻腾不息,屈翁忧国忧民的思想对我一直影响至今。我想,我精神的风骨和人生的品格的确定,盖源于此。

初中毕业后,我父亲要我就业,为了能继续读书,我利用假期在父亲面前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表演:每天我用15岁的肩膀或用手推车去工地挑运上百斤乃至200多斤的砖头,然后挣回1块钱,并偷偷发动全家替我说情,才终于迫使父亲同意我上了高中。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爆发,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如果说当年“备取生”的事改变了我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那么“九一三”事件则让我对人生和世界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忧国忧民的思想这时如病菌一般渗透了我的每一个细胞,使我的心灵再度陷入痛苦之中,这种痛苦已不再是因为个人的前途,而是出于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忧虑。为了渲泄自己愤世嫉俗的情绪和对现实的不满,我开始蓄长发,穿破棉袄,在腰间特夸张地系上一根草绳,并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我已暗暗确立了奋斗目标:报考四川大学中文系,并斗胆创作了一个小

话剧。此剧在老师的帮助下，还公开参加了演出。这个小话剧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它成了我中学时代精神黑夜中的一盏小油灯。

然而高中毕业时，却突然冒出一条现行规定：凡应届毕业生一律不能参加高考，必须下乡“接受再教育”两年以上才有报考的资格，这一规定差点摧毁我的神经。上学求知，这本是我人生的最低需求，可我不明白我选择的这条路为什么总是横满荆棘坎坷？不能考大学中文系，就意味着我当作家的梦想从此破灭（那时的我以为只有上了大学中文系才能当作家）。我为此夜夜失眠，不久便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家里的人见我整天神经兮兮，望着书本发痴发呆，便让我外出消遣散心。于是我以屈翁自比，以一副流浪诗人的模样去了成都的武侯祠、宝光寺和杜甫草堂等地，借古人和先哲的遗风来抚慰我受伤的灵魂。归来后，为了自食其力，我每天去做临时工：挖地基，扛钢筋，抬水泥板。从小只知埋头读书的我这才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困苦与艰辛，于是一定要为老百姓着想、要替老百姓说话的所谓平民意识从这时起开始渗进了我的血液。可我仍感前途渺茫：上大学无门，直接参加工作又不允许，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下乡！正在这时，招兵的消息从天而降，我当即决定当兵。理由很简单：当了兵，既可逃避下乡，两年复员回来后又能分配工作。而当接兵的同志了解到我是学校宣传队和篮球队的队长后，也想方设法要我这个所谓的文艺骨干。于是，1973年底我便被一列军用闷罐车拉到了如今闻名世界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当了兵的我，心里依然揣着一个作家梦，上学读书仍是我唯一的渴求。但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却被分到了全部队最偏远最艰苦的工兵团三连打山洞（这个山洞就是现在发射卫星的地下指挥所）。打山洞是绝对的苦力活儿，还时刻面临塌方的危险，因而自认为不可一世的我精神再度陷入苦闷之中，对前途感到渺茫甚至

绝望——在打山洞的短短 20 天里，我就掉了 20 斤肉！幸运的是，20 天后我被调到了宣传队，宣传队是专业性质，我的任务一是创作演出节目，二是在乐队当乐手。这当然令我幸福无比干劲冲天，于是一开始我便写了个三幕话剧，令老兵们大吃一惊刮目相看，然而在那个年代搞创作无疑等于受苦役，不光写一般的剧本要紧跟形势图解政治，连写三个半句半对口词也要遵循“四人帮”“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因此从 1974 年到 1977 年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尽管创作了不少文艺节目甚至还斗胆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可几乎全是违心的概念化的产物。而身处文学沙漠中的我，除了一张军报、一本《解放军文艺》以及我自订的一本《朝霞》外，几乎看不到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因此我的作家梦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以后争取到科委文工团当一名编剧。

不幸的是，1977 年宣传队解散，我创作的作品失去了表现的舞台，我想当编剧的愿望也随之破灭，虽然这时高考制度已经恢复，可部队院校没有文科，我想上大学的愿望再次落空。这时，西昌基地急需培养技术人才准备发射卫星，我便成了培养的对象。是为了闯出一条路，在一个没有星光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封存了我所有的文艺书籍，烧掉了我所有的创作手稿，满含着辛酸的泪水与昨天的梦想告别，而后开始在部队的“土大学”里学习高等数学、电工学、无线电、晶体管、计算机等理科知识，其痛苦简直不忍诉说（我第一次数学考试只得 3 分，一年之后才使每科成绩都达到 90 分以上）。1979 年，我被派往上海学习用于发射卫星的大型计算机。我每天凌晨 4 点起床，先自学计算机知识，接着到电影院看 6 点钟的第一场电影，然后 8 点赶到无线电厂学习。每到礼拜天，我便带上面包和开水，跑到上海图书馆看上一天的文学名著。从上海回部队后，我被任命为计算机主机组技术员。一日，我将自编的唱歌程序输入计算机后，计算机第一次唱起了我



输入的歌曲，那一时刻我欣喜无比，感到这个世界不光文学，科学也同样充满了魅力，于是我决定报考理科大学，将来好当一名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可正当我为考试做好了充分准备并有绝对把握考上理科大学时，上级一纸命令，又要将我调往政治部门当文化干事。我为此在上千人的会场大发雷霆，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命运的选择。

我干文化工作后，作家的梦想又开始复现出来。不过这时的我已少了几分浪漫，多了几分实际，生活已经教我懂得，梦想与现实之间总是隔着一段弯弯的距离。1981年，我终于第一次跨进了大学的门槛——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但由于当时的我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持否定态度，因而无法专心听课，便开始写诗，开始投稿。同年8月，我的第一首诗在《凉山文艺》发表。1982年，我考入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同年10月，在《山西青年》举办的全国写作竞赛活动中，我的组诗在4万份参赛作品中夺得第一名，并在《山西青年》同时配以评论文章予以刊出。年已26岁的我，这才感到青春第一次放出了一点光彩。

1984年，我被借调到国防科委创作室帮助编辑书稿，文学的视野开始由山沟转向北京。我的诗作再次在《山西青年》获得第二名，并应邀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中秋诗会”。在中秋之夜，我站在西子湖畔，面对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和几十位老诗人鼓励的目光，在月饼的咀嚼声中朗诵了我的获奖诗作。就在这次诗会上，我有幸结识了邹荻帆、陈敬容等著名诗人，并得到了一本由艾青签名赠送的《艾青诗选》。按理说，这次“中秋诗会”为我闯入诗坛已打开了绿灯，可正是这次诗会使我看到了诗的大海和自己的渺小，于是我断然决定：不再写诗，转写小说。也就在这一年，沉寂了14年之久的西昌基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那个惊天动

地的夜晚，我亲眼目睹了火箭腾飞时那幅人间最美的风景。那风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重重地撞击着我的心扉，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类智慧和力量的神奇与伟大，同时也似乎为我打开了一扇小小的文学的天窗，于是连什么是报告文学也没搞清的我很快写出一篇 1.5 万字的报告文学，试着寄给了四川《科学文艺》。两月之后，《科学文艺》以头题位置隆重推出。这便是我的报告文学处女作《用生命编写程序的人》。为了充实自己，1986 年我又报考了西昌师范专科学校政治历史系。大学两年中，我的航天人系列小说和报告文学相继在一些刊物发表，四川的大型期刊《红岩》还先后以两个头题推出我的中篇报告文学和中篇小说，并在封二以醒目位置配发了我的“作家近照”。接着，我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随后又被四川作协文学院聘请为合同制专业创作员。这意味着我当作家的梦想已经实现。可不知何故，我却找不到一点作家的感觉，作家在我心中还是那么神圣，那么遥远！我依然心处梦中，人在旅途。

1989 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可入学后的我对文学却有一种极其伤感的情绪；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那场政治风波刚过，国家、民族的命运尚且难测，从小就忧国忧民的我哪还有心思去伺弄文学！但现实的问题是，我总得干点事情，而我除了伺弄文学又愿干和能干什么呢？好在时间是个好女孩儿，她既能使我淡忘过去，又能让我想想未来。事隔几个月后，我经过对国内的文学现状和作家队伍的透视分析，决定先把报告文学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攻方向，并悄悄编织起了我的“航天文学”之梦。于是《走出地球村》便列入了我的“航天文学”的第一部。

1990 年 1 月，我利用课余时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顶着风雪在北京开始了《走出地球村》的艰难采访，并开始了对如何突破中国科技题材写作的思考。但就在 3 月的一个夜晚，我偶然翻

到一则关于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近日将在西昌发射美国“亚洲1号”卫星的消息。这消息如同一团火灼烤着我的心，令我兴奋无比、激动难抑：中国、美国，东方、西方，火箭、卫星，人间、天上……仿佛是某种神灵的启示，苦苦思索了多年的大脑突然有一种闪电划过般的感觉，一部优秀的作品在那一瞬间似乎便已形成。于是第二天我便向系里请假要去西昌采访。可系里的老师说我已经请过一次采访假了，不行。我急了，说，即使我父母去世我也可以不请假，但这次无论如何你们得给我假！几位老师被我的真诚感动了，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当即骑车去买第二天的机票。可到了售票处一打听，还有当天的机票。于是我临时改买了当天的机票，将自行车往路边一扔，便急忙“打的”赶往机场。等我气喘吁吁登上飞机时，离起飞时间只剩几分钟了。

五个月后，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部2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当代》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用一个星期看完稿子后，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稿，决定发表、出版。可当这部稿子送到某个领导手上后，却一拖再拖，甚至当权威部门——国防科工委作试部签发了“此稿没有泄密问题”的意见并盖上堂堂正正的大公章后，这位领导仍坚持“审查”了一年多，最后在各方面的谴责声中才有了一个既不同意出版也不同意不出版的没有一条审查意见的“审查意见”。幸好我手头留有一份复印稿，这才被一向颇有眼光和胆魄的《当代》以13万字的篇幅隆重推出，作家出版社又大胆出版了全书。此稿问世后，在社会各界引起较大反响，很快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等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并获得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后来还入选了《中国报告文学精品文库》并被海外出版，我的老部队西昌发射基地还为我记了二等功！

无疑，《飞向太空港》是我真正的成名作，她为我带来了荣誉

和福音。只是长达一年多的审稿，使我对报告文学伤透了心，我甚至一度发誓再也不写国防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但经过近两年的自我反省后，我认识到，中国的航天发射乃我堂堂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与个别认识肤浅的人无关。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个人，赌气不是应有的风度，而超越个人、超越阶级、超越民族乃至超越地球的一切恩怨是非，才是应该具有的胸襟和气度。于是1992年8月，在《当代》和作家出版社的鼓励支持下，我再次奔赴西昌发射场，接着四个月的时间赶写出了《澳星风险发射》。写作此稿时，难免心有余悸，我准备了对付各种麻烦甚至打官司的材料，远远超过了我写作所需的材料。甚至写到某些章节时，仍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幸运的是，此稿得到了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大力支持，并再次获得了1992—199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解放军“八一文艺奖”。

之后，我又写出了《走出地球村》和《远征三万六》。

至此，应该说我的作家梦已经实现，可还是不知何故，少年时那种神圣的作家的感觉是越来越找不着了，作家于我仿佛依然是一个梦。写作对我来说，似乎仅仅是刚刚开始。我距普通人越来越近，离作家却似乎越来越远。文学在我心中，再也不是从前梦中的情人，追恋的女神，而变得实际又平常，就像我冷了时的一件衣服，累了时的一张沙发，困了时的一张木床，饿了时的一碗米饭，渴了时的一杯热茶。我已经习惯用一颗平常之心来看待自己，来对待文学。当然，文学本身，在我心中仍是高尚的，我仍把文学看作我生命的一部分，把写作当做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更不为自己多年苦苦追求的梦想而后悔。

我想说的一点是，人生不光要有梦想，还应该有境界。诚然，一个人如果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已乃大幸！因为多数人在一生中连自己的梦想也无法实现。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只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仅仅是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跨越了他生命的第一个层次；要想进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和生命的第二个层次，还得让自己的心灵升华到一定的境界，从而使自己在纷繁复杂物欲横流的滚滚尘世里不致迷失方向乱了分寸。生命的过程，既是一个自我不断奋斗求索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抵制外界诱惑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需要对自己内心的境界不断进行修炼的过程。你奋斗求索的功夫下得越深，你的生命便会显得越加充实；你对外界诱惑的抵制越加彻底，你的生命便会活得越加潇洒；你内心的境界修炼得越加高深，你的生命便会变得越加超然。人就是人，仙就是仙，我们无能更改上帝事先作好的这一安排。然而人和仙，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人之所以比仙活得累，就因为人比仙有更多的欲望和需求，而正是这些欲望和需求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真正的作家，文化艺术的修养固然重要而不可或缺，但境界的修炼，恐怕更为重要。搞文学的人，心里应该有自己的那一尊佛，应该有比一般人更为高远的心智和一生为之追求的大境界，应该在属于自己的漫漫精神长夜中潜心修炼，永梦不醒，同时更应该向着洞悉自己、降服自己之道步步逼近；因为降服自己，或许才是一个作家的最高境界！

为此，近几年来我除了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外，有意识地开始了对自己内心境界的修炼（这当然仅是有了意识而已，境界的修炼恐怕是一件终身也难以完成的事情）。我把写作的过程，当做修炼自己人生境界的过程。而当作家搞写作，已不再是我人生的目的，只不过是我选择的一种人生方式罢了，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炊事员做饭。至于我写的这四本小书，我相信只有愚蠢的作家，没有傻瓜的读者；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每一位读者，都是我的上帝！我只能说的是：中国的航天事业，是关系到我堂堂中华民族的荣誉和尊严，关系到一个民族乃至整

个人类开创空间文明、寻找新家园的伟大壮举，无论从文学还是史学的角度来说，都应该有所展示和记录；我只不过用四部书稿向世人和历史证明，我做了一件别人没做而我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丛书！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们！

李鸣生

1996年10月于北京

# 序 章

## 本文参考消息

### 参考之一

法国《世界报》消息：1990年2月23日，欧洲空间局“阿里亚娜4”型火箭，在法属圭亚那的库鲁发射场升空后不到两分钟爆炸。这枚火箭的爆炸，使它所载的价值4.3亿美元的两颗日本通信卫星毁于一旦。这是“阿里亚娜”火箭自1987年以来连续成功发射了17次后的第一次失败。航天公司发表公报说，这次失败是因两部发动机出现故障而引起火箭失去平衡，从而在动力压下导致爆炸。

（笔者按：这次爆炸，是法国“阿里亚娜4”型火箭自1988年底开始首次商业发射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2至3亿法郎。本来，法国打算利用日本人对它的信任，通过发射这颗日本通信卫星来打开它在亚洲的航天市场，但不幸失败，使它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的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 参考之二

苏联塔斯社消息：1990年2月30日，美国“亚特里蒂斯”航天飞机施放的一颗侦察卫星在空中遭到解体。卫星解体后分成了四块在空中飘移，彼此相距数百公里。其中一块已于3月19日进入太平洋上空的大气层，而另外三块预计将在4月12日进入大气层后被烧毁。

（笔者按：美国发射的这颗卫星，价值10亿美元，重达20吨，颇像中国的大卡车。它主要用于获得高分辨率数字图像，并可窃听通讯。这是美国继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后的又一重大失败。）

## 参考之三

中东《金字塔报》消息：1990年3月14日，由美国“大力神3”型火箭发射的“国际通信卫星-6”，升空后未能按预定时间同第二级火箭分离。虽然经地面工作人员数小时努力后，使卫星脱离了火箭，但却把一个应将卫星送入高轨道的发动机留在了火箭上，因而使卫星处在一个不安全的低轨道上。

（笔者按：“大力神3”型运载火箭，是美国火箭中最大的商用火箭。它可将56.75吨的有效载荷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它在过去134次的发射中，有129次获得成功，可靠度达96.3%。它这次发射的这颗国际通信卫星，本可中继12万条电话线路，同时通话和转播3个电视频道节目，还可供100多个国家进行电话通信和电视播放。可惜，事与愿违，造成损失5亿美元，使美国的商业性火箭发射计划，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挫折。

由于在短短的20天里，美国和法国的航天发射连遭3次惨败，故西方有人声称：1990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灾星年”。）



#### 参考之四

美国《商业日报》消息：1990年3月8日，亚洲卫星公司行政总裁薛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亚洲1号”通信卫星将在中国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次发射西方制造的最先进的通信卫星。我们期待在4月5日至9日之间，中国将“亚洲1号”卫星送入太空。

（笔者按：按原计划，“亚洲1号”卫星的发射日期是在1990年4月13日—20日之间。但由于发射技术的准备工作比预期进行得快，故中美双方认为可以提前发射。薛栋先生发表讲话后，西方和香港报界第二天便传递了要提前发射的信息，在西欧诸国很快引起反响。尤其是亚洲各国，对这亚洲的第一颗通信卫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韩国、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和孟加拉等国，纷纷向亚洲卫星公司表示要订购卫星转发器的意愿。而亚洲卫星公司正是打算通过出租这颗卫星上的24个转发器得益，因为每个转发器一年可收租金130—200万美元。）

#### 参考之五

北京新华社消息：1990年4月4日，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有关人士透露：中国将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把“亚洲1号”通信卫星送入轨道。这项发射定于1990年4月7日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

据了解，这颗卫星是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由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卫星公司购买和经营。目前，发射工作进展顺利。

这是中国首次承担商用卫星的发射服务。届时，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将联合进行发射现场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将用英语向国外同步播出。

（笔者按：就在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的同时，中央电视台在新